“最美医生”王文涛向“虫癌”宣战

最美医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200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王文涛到四川省甘孜州巡回义诊，看到当地很多群众饱受包虫病的折磨，而基层医院的医生底子薄、医疗水平不高，很难为患者解决病痛。

“以前，当地医院不能独立做大手术，村民很少能得到有效治疗，很多村民因为肝包虫病致残甚至死亡，作为医生，我应该为他们做一点事情。”王文涛回忆说。

从此，他就再也没放下过那里的患者。10多年来，他不时趁假期或巡诊的机会去藏区做手术，近5年来，更是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藏区，查房、办讲座、手把手教基层医生做手术。

包虫病分为囊型和泡型，泡型包虫病患者若得不到及时的治疗，10年病死率可达94%，又被称为“虫癌”。在我国，此病高发地区是西部藏、牧区，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的患病率一度高达12%，包虫病成为当地人因病致贫的重要原因。王文涛说，全国直接受包虫病威胁的有上百万人。

王文涛介绍，包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传染病，主要发生在肝脏，目前没有特效药，只能靠手术来治疗。患者大部分来自藏区，卫生意识比较弱，加之地域、文化、交通、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患者来就诊时，一般已经是中晚期。

肝包虫病尤为凶险，许多患者就诊时，大部分肝脏已被侵蚀。而肝脏是人体的核心器官，涉及到血管、胆管、静脉等重要管道，是普部外科手术中最凶险的部位。诸多原因使得该病的手术风险高、难度大。

到了病程后期，患者肝脏附近的重要管道都被侵犯，非常危险，但又难以通过传统的手术进行治疗。经过探索，王文涛成功运用“体外肝切除联合自体肝移植技术”——把患者的肝脏拿到体外，切掉病变部位，再将剩余的肝脏修补起来，植回体内。这个技术的理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德国科学家提出的，在我国，清华长庚医院董家鸿院士最先将其用于治疗肝包虫病。

王文涛介绍，这类手术很复杂，需要多学科合作，手术费时很长，要10-12个小时，难度也比较高。但好在肝脏是患者自己的，没有排斥反应。这样的手术，王文涛已成功完成了92例，他的团队也是世界上完成这一复杂手术最多的团队。王文涛说，国内同时有器官移植技术和肝脏外科经验的医生不多，这两种技术对肝包虫病的手术都非常重要。王文涛还把这一技术推广到青海、新疆、甘肃等省的医院，到那里演示手术。

2014年3月，王文涛接诊过一个来自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姑娘，患者二十多岁，骨瘦如柴，腹部有个大包块并且长期疼痛，还出现了严重的黄疸。“当时她的肝功能已经不全，生命几乎要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患者跑了很多医院，最终辗转找到王文涛。王文涛和团队先给她“降黄”——把胆汁临时引出来，让黄疸降低一些，改善肝的储备功能，然后才敢做手术。十几个小时后，王文涛成功挽救了这个年轻的生命。如今，患者已经恢复健康并结婚生子。

王文涛认为，自己的能力再强，精力也有限，做不了太多事，而培养当地医生才最关键。如果把技术教授给基层医生，让他们有很好的服务能力，就相当于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更好、更安全、更高效、更高质量的治疗。“这是造福一方的事。”

为此，王文涛先做了调查研究，再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方案。比如，基层医院以前为什么不能做肝包虫病手术，存在哪些技术领域的问题，如何攻关；怎么让包虫病得到根治；包虫病晚期不能治疗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延长患者生命；如何加强老百姓对基层医院医生的信任等。

在王文涛常去“传帮带”的甘孜州医院，原来只有一两位医生能开刀，现在有七八位医生可以做四级手术（技术难度大、手术过程复杂、风险高的手术——记者注）。以肝包虫病手术为例，过去全州一年只能做20多例，现在一年能做300-500例。王文涛还带去了各个科室的医生，帮助当地医院多学科、全方位进步。

基层医院大都地处高原，王文涛常常要开车走七八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路上常会遇到堵车、下雨、下雪甚至泥石流。高海拔让王文涛夜里难以入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一次。因为高原反应，王文涛不得不一边吸氧一边做手术，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时间显得更漫长。

基层医生尊称王文涛为“老师”，说他是“没有架子的大专家”，渴望跟他学习，常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来。在王文涛到来前，医生们会为他安排好住处，知道他睡不好，还把氧气瓶送进房间……当地居民腼腆、不善表达，常常给王文涛献上哈达，或是冲他憨憨一笑，或是摘帽弓腰以示感谢。

“这么多年，很感动，民族地区的村民和医生都很暖心，我很愿意帮他们，也很欣慰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已经越来越强。”王文涛说。

荣誉村民 扶贫尖兵

（上接1版）几个月下来，布哈积累了整整两大柜村民档案。在村支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两面黑板，上面记录着每一户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与帮扶方案。

此前，布哈从未接触过扶贫工作。他跑遍周边区县，“搜刮了一堆扶贫学习资料”。还协调总队为村子修河道、整治村容村貌，并建起蔬菜大棚、养殖基地，“一定要把产业办起来”。

梭梭拉打村过去主要种植马铃薯，村民对其他经济作物不了解，布哈就请来省里的农业专家教大家种植青椒、草莓，自己也跟着从零学起。

最难的是2018年夏季，布哈联系总队在村里办起一座生态养殖基地，引进岩鹰鸡等特色品种，但雨季很快来临。一夜大雨过后，鸡瘟暴发，死了几百只鸡。

那一天，布哈彻夜难眠，打了整整一夜电话，终于在凌晨4点钟时联系到了当地养殖专家前来救助。几天后，等养殖场工作回到正轨，他发现自己“头上多了好几撮白发”。

如今，35岁的布哈有着与年纪不相符的“沧桑”。经常奔波在田间地头，他被晒得黝黑，眼角已长出细小的皱纹，但双眼总是目光坚定。

“扶贫是难，但难怕什么？军人做事就是不怕困难，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解决！”布哈的嗓音略微沙哑，说话中气十足。

梭梭拉打村是彝族村落，而彝族刺绣是有名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件纯手工彝绣服装能卖到三四千元。走访中，布哈发现村里男人大多外出务工，妇女是主要劳动力，大多数人会彝绣。

发展彝绣特色产业成了布哈心中“最重要的事”。去年年初，他开始四处拜访民间彝绣专家，邀请他们来村指导教学。2019年4月，某电商平台在全州范围内寻找彝绣项目合作伙伴，布哈“拉下脸皮”，花了七八天时间给考察团队里的每个成员打电话自荐，终于争取到合作名额。

“现在是‘非遗+时尚+电商+扶贫’的模式，要让我们的彝绣、民族文化走出去。”布哈说，彝绣已为村子带来50万元的收益。

事实上，起初在村里开办彝绣培训并不容易。村民不愿来学，不相信自己的手艺能赚钱，布哈急在心里。他想出一个办法，“我自掏腰包，谁来学就奖励一百块钱，管饭”。这一招果然吸引到不少人，大家拿到第一笔收益后积极性不断高涨，很快变成了“宁可倒贴钱都要抢着来”。

“最重要的是让大家自己肯学、肯干，要把自信、自强、自立的种子种到心里。”在布哈看来，“扶志”和“扶贫”同样重要。

过去，梭梭拉打村只有一个幼教点，破旧的平房里最多招收47个学生。“再苦不能苦教育”，布哈积极联系总队，在村子里建起一座现代化幼儿园，又引进了一套远程英语教学系统，如今学校成为周边地区的“示范校园”。

看到适龄儿童在干农活，他都要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学校里去。两年多时间，村里幼儿园的学生从47人增加到200人，村里出了16名大学生。

“更重要的是村民的观念改变了，他们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布哈欣慰地说，过去酗酒的“懒汉们”勤快起来，不少村民省吃俭用，“砸锅卖铁也要供娃娃读书”。

“布哈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兵哥哥，是我们的领路人。”村民尼惹拾呷正是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之一。大学毕业后，他曾去广东打工，2018年回村时，被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他决定回来，“和布哈大哥一起为村子做点事”。

他们的努力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去年年底，这个贫困发生率曾高达34%的村子已实现全面脱贫，贫困人口人均增收2000元，户均增收8000元。如今，彝绣工坊、养蜂合作社、蔬菜大棚等一批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孩子们在新修的河边栈道和广场上玩耍。

村后的山坡上，竖立着一排醒目的标语，那是布哈和战友们专门修建的，如今连村里不会说普通话的彝族老人也能牢牢地记住这句话：“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宁夏：青年志愿者行动在基层

（上接1版）

投身脱贫攻坚 做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参与者

在吴忠市同心县，杨睿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于贫困人口较多的马高庄乡。2018年大学毕业后，她就在同心县投入到脱贫攻坚的工作中。当年冬天，她和40名小伙伴接到了全县危房危窑清零行动的工作任务，白天进村入户对住房主体结构、外观及周边环境等进行现场核查，晚上整理汇总核查认定信息，建立电子台账，为危房危窑改造做前期基础摸排工作。他们克服严寒雨雪，连续奋战1个多月，高标准完成了全县2.7万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核查认定工作。

在同心县，扶贫车间是移民村解决贫困家庭就业的重要渠道。杨睿和其他志愿者还担负着扶贫车间的日常管理、招工、宣传、活动组织等工作。当了解到当地一些妇女因为要照顾孩子而放弃扶贫车间工作的情况后，在团同心县委支持下，杨睿和同伴还实施了“小方桌——用爱托起孩子的梦”公益项目，解决孩子在放学之后、车间工人下班前这段时间的管理真空问题。

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做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出生于工业重镇石嘴山，28岁的王宇箫见证了工业发展带来的“后遗症”，自上大学开始，他便在生态环保领域谋划实施服务项目。2014年，他策划的守卫塞上湖城项目开始实施，吸引了一大批热心人士参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如今，王宇箫已成长为宁夏生态文明促进会副会长。

守卫塞上湖城项目借助卫星地图、申请信息公开、收集和分析数据等方式，筛选问题企业和收集排污证据；还通过现场察看工厂河流，寻访当地居民、企业，使用无人机等手段，发现企业和河流问题。“针对多元化水污染，倡导‘人人都是河流卫士，做河流的守护者’，推动了民间河长制的形成；此外，还建立了民间与政府的沟通机制，优化问题解决方案。”王宇箫说。

过去6年间，该项目已经建立起4地市的黄河护卫队；建立宁夏黄河排污数据库；累计调研26条河流，巡查800多公里，发现50多个污染点，推动17个环境问题解决，推动银川市4条黑臭水体的治理。

制度化专业化项目化 推动志愿服务提质增效

2019年9月，在团宁夏区委推动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志愿服务条例》正式施行。“有制度支撑，志愿者招募程序清晰、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组织者更有底气了，志愿者积极性也更高了。”团中卫市中宁县委书记刘文霞说。

在宁夏，近年来，团宁夏区委结合实际，还先后制定了《宁夏大型活动志愿者招募管理办法》《宁夏西部计划志愿者考核管理办法》《宁夏防疫志愿者服务规范》等制度规范。

为打造专业志愿服务团队，团宁夏区委结合不同的志愿服务领域，先后成立宁夏禁毒志愿者总队、宁夏环保志愿服务队、宁夏助残志愿服务总队、“河小志湖小愿”节水护水志愿服务队等一批专业志愿服务队伍；推广“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协作模式，动员持证社工加入志愿者队伍。

宁夏用项目化扶持青年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连续举办4届宁夏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来自全区230余家单位和社会组织的700多个志愿服务项目参赛，共评选出87个获奖项目，筹集经费97.5万元，对获奖项目给予经费支持；同时，推荐64个优秀项目参加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得9个金奖、44个银奖，4个项目被评为首批全国志愿服务示范项目。

以

论学习贯彻

人民日报评论员

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要求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调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创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今天，我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同时，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党中央作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要看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更加凸显了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只有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还要看到，只有进一步夯实创新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才能使国内大循环活力更加强劲，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现在，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紧紧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着力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加大投入，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

中华民族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立足科技创新，释放创新驱动的原动力，让创新成为发展基点，拓展发展新空间，创造发展新机遇，打造发展新引擎，我们就一定能推动中国号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载8月28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发）

创新 深圳“再出发”

（上接1版）

这是一段从要素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长期变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创新之城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阶段性跃升的时代节奏。创新之魂，在时间的长河中加速锤炼。

“如果甘于流俗，那还叫特区吗”

深圳经济特区一路奔跑，以探路者的身份披荆斩棘，也在成长中面临新的烦恼。深圳是中国第一个面临“四个难以为继”的超大型城市。在经济的全力冲刺中，深圳率先遇到了土地空间、生态环境、能源资源、人口等“四个难以为继”。

作为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已经不再是独有优势，深圳一度出现经济低迷、股市停发新股、大量外资迁走等现象。有评论说，“特区不特了"深圳，你被谁抛弃”。深圳人看淡光环，开始艰难的“二次创业”。

英国《金融时报》曾经这样描述深圳：这是中国最具危机感的城市。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这个城市每隔三五年都要进行一场“深圳你被谁抛弃”这样的自我探讨，而对于深圳人来说，这种多少带点自虐色彩的拷问是真诚的，这是深圳不甘于流俗的一种城市特征和表现，“如果甘于流俗，如果进退行止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那还叫特区干什么呢？”

在创新驱动力的作用下，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异军突起，不仅涌现出华为、腾讯、中兴等一大批科技领军企业，“全球阅读典范城市"创意之都"设计之都”也成为深圳的城市新名片。

2011年，深圳举办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为天下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十句话高票当选。这些话语是深圳城市精神最核心的表述。

“深圳不是你的故乡，却是你梦想的主场。”来自天南海北的中国人移居至此，形成了一种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在这里人们鼓励“别出心裁”，不欣赏“沉默是金”，追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比如十年前成立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一张白纸从零开始”，走出了一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实现超常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之路，基本建成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产业升级引领区，形成了获得充分认可的“前海模式”。

海纳百川的深圳，更是在近年来发展创新型经济，超前部署了生命健康、海洋发展、5G通信等未来产业；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外贸出口连续22年居全国首位。

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在深圳，经常可以听到“4个90%”——从所有制结构来看90%以上是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90%以上是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中90%以上来自民营企业；专利发明中90%以上来自民营企业。

在这种结构中成长起来的城市，不问出身、不问学历、不问官阶、不问贫富，骨子里洋溢的是平等。在这个规则说了算的城市，以法治为本、恪守公共秩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就在8月26日，深圳通过了我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为诚实守信的债务人重新站起来提供可能。这项法规全面而系统地促进和保护科技创新，在未来必将为深圳的科技创新提供法治保障。

也正是在这样的营商环境中，深圳诞生了很多奇迹。从华强北赛格科技创业园一栋老楼中起步的腾讯公司，从创业时的5个人发展到现在的6万多人，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巨头之一。

因才而兴的深圳，深知人才是这个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1988年，深圳率先颁布《深圳市鼓励出国留学生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留学人员可享受再次出国来去自由、市内自由流动、评职称不限指标等十多项特别待遇。从那时开始，深圳就向世界展露了它求才若渴的决心。

从2002年实施的《关于引进国内人才来深工作的若干规定》，到2011年实施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孔雀计划”》，深圳致力于吸引高层次人才。

40年来，深圳人才政策不断推陈出新，2016年又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为深圳人才立法。

“深圳让我想起了硅谷，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年轻人，共同创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区。”在深建设RISC-V国际开源实验室的图灵奖得主、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享誉世界的顶级科学家大卫·帕特森这样评价深圳。

深圳市人才工作局局长张林介绍说，现在的深圳，有46位全职院士、近1.7万名高层次人才、14万海归留学人员，每年加入深圳人行列的高校毕业生有十几万，人口净增长速度冠绝全国，还有50万幼儿园在园儿童。这是深圳未来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红利，这是在全世界都少见的年轻态城市。

“现在的深圳，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张林告诉记者，深圳吸引人才的政策红利时代已经过去，真正顶尖的人才环境是靠一种文化，深圳正在锻造这种文化。

（上接1版）

与成为国际一流专家的可能擦肩而过，罗其花在密云农村干得风生水起。“有一种被需要的成就感。”她说。

最初跟蜂农打交道的时候，她只会讲书本上的大道理。后来发现农民从实践中获得的养蜂智慧远远超过书本理论，她开始俯下身子，把自己的研究积累与蜂农需求结合起来，从蜂王品质的改进，到蜂箱技术的完善，再到蜜蜂产业链的延伸，罗其花成了蜂农们最信赖的“博士妹子”，蜂农们对她口服心服。

密云是北京的重要生态涵养区，那里优良的自然禀赋适合发展无公害的蜂蜜产业。罗其花初到密云的时候，当地只有几百户人家养蜂，如今已经有2000多户农户以蜜为业，蜂农的销售额一年有1亿多元，带动相关产业的收入有8.5亿元。

她的朋友圈里都是蜂农的甜蜜故事。蜂农张良（化名）最让罗其花牵挂。张良年轻时走过弯路，重返社会后一度为贫穷所困。他找到罗其花要学养蜂。急脾气的张良爱发火，村民都对他有几分忌惮，劝罗其花要当心。

罗其花说，她从张良的眼睛里看到了要过好日子的渴望，她愿意拉他一把。张良特别卖力地要把日子过好，肯下苦功夫跟着罗其花学习养蜂技术。如今的张良，不仅靠养蜂摘了“低收入”的帽子，还娶上了媳妇。

35岁的刘金良是罗其花熟悉的“蜂二代”。到了他这一代养蜂人，由于村里来了蜜蜂博士，实现了科学养蜂，蜂蜜的产量和品质都有很大的提升，再赶上政府对蜂农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养蜂是能实现收入翻番的致富希望。

在罗其花看来，与她同龄的年轻蜂农更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们总是最积极地尝试新的技术。一批批“蜂二代”的回归，补齐了北京乡村小康的短板。在密云，有362户低收入农户通过养蜂实现了脱低致富。

在北京平谷的农村，“桃二代”岳巧云撕掉白领标签，回家成立了蜜桃合作社，这一举动一度让她的父亲、老桃农岳清涛不解，“做农民多苦”。老桃农更不解的是，女儿要颠覆他传统的卖桃模式，通过合作社联合十里八乡的桃农们把蜜桃卖到网上去。

渐渐地，大家发现找岳巧云卖桃价格更合适。以前桃子一股脑儿地被经销商拉走了，大的小的，混在一起，农民的议价能力很差。而现在，通过互联网平台售卖，桃子分级了，一分钱一分货，优质品种能卖上价了，也倒逼桃农不断改进桃的品质。

桃农合作社做大了，岳巧云设计了一些叠纸盒、装桃的辅助岗位，专门招收不能干重活儿的乡亲来帮忙。村里的16户低收入家庭，现在也加入了岳巧云的合作社，一些因病致穷的村民在合作社做一些简单的活儿，一年也能有两万元的收入，实现了“脱低”。

老桃农岳清涛说，女儿不仅做大了村里的桃事业，还能拉村里的困难户一把，这是他那一辈桃农没能做到的。

奔小康路上 总有年轻人干事创业的机会

总有人问罗其花，如果当时选择去国际顶级研究机构做研究，现在应该也是重量级科学家了，对此她是否后悔。罗其花也总是反问，能帮助几千户人家过上好日子，不也是伟大的事业吗，而且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罗其花说，作为一名研究蜜蜂的博士，密云要发展以蜂为特色的产业，给了她个人一个无边的发展空间，她全部的研究、全部的设想都能落地，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机遇更重要呢？

罗其花卷起袖子在密云和蜂农打交道的9年，也正是密云实现产业转移、谋求新发展的关键时候。过去密云曾经以采矿和养殖业为支柱产业，但这两个产业都与密云作为北京重要生态涵养区的定位不相符，需要在保住绿水青山的前提下重新布局。

几乎零污染的养蜂产业似乎成为密云最合适的选择，这也是过去9年间罗其花的机会。

几年前，罗其花曾经建议，政府和蜂农一起为蜜蜂买保险，以化解天气等不利条件对蜂农的冲击，这看似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最后被当地政府拍板认可，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蜂业气象指数保险”，极大地调动了蜂农养蜂的积极性。

85后姚志锋感受到的是年轻人在北京高质量发展中的机会，以及一个具有创新气质的城市对创业青年的支持与宽容。这位清华大学雕塑专业毕业的年轻人，目前跨界成为北京西三旗的一名“码农”创业者，在3D打印行业已经小有名气。

姚志锋的团队目前入驻北京西三旗的“金隅智造工场”，那里曾经是北京最大家具厂——天坛家具厂的厂址。几年前，家具厂搬离北京，留下的大厂房被改建为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并立下了国际智能制造创新中心的目标。姚志锋公司租用的一个LOFT办公区，就是当年家具厂的油漆车间。

对初创企业来说，“金隅智造工场”不仅房租合适，而且能提供知识产权、法律、融资担保等保姆式服务，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相近的生态圈里，大家能很快找到上下游的伙伴。

“金隅智造工场”创建了公共服务平台，利用姚志锋的企业这样的3D打印技术，为园区内的企业提供小样试制平台，帮助企业加速产品迭代。年轻的创业者可以安心出成果。在北京，类似“金隅智造工场”这样让年轻人安放创业梦想的场所比比皆是。

后小康时代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这一代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眺望着下一个百年目标，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他们事业的方向。

尽管密云现在已经是北京养蜂第一大区，但罗其花有更大的梦想，比如实现更大规模的养殖、用蜜蜂撬动其他产业发展。罗其花的设想是，拉长养蜂业的产业链，通过蜜蜂授粉，提升当地果蔬的品质；发展蜂疗，带动当地的医养行业；利用蜂文化资源，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这些设想，似乎超越了她当初蜜蜂病虫害研究的专业。说起未来的蓝图，罗其花眼里放光。

今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也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尚在胶着的时候。合作社的桃农们担心今年桃不好卖了，找了岳巧云好几次。岳巧云也早早做了准备，开了直播账号。大桃成熟后，每天桃农们摘桃、分拣的场景都网上直播，引起了不少关注，今年的卖桃季已近尾声，合作社桃农们的收入并未因疫情受到影响。

王丹也是和岳巧云一起返乡的“桃二代”，也是最早一批通过电商卖桃的，一年的销售额有500多万元。今年受疫情影响，当地政府专门请她给当地桃农培训如何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她选了最火的短视频营销技术教给桃农。

一位64岁的桃农跟着王丹通过直播卖桃，最多的一次卖了96箱，成了村里的网红。还有一名桃农自己剪的短视频，一晚上就播放了21万次，粉丝暴涨好几百人。

北京市平谷区也推出了“互联网+农产品”产业扶持的三年行动计划，并与多家物流公司展开战略合作，在13个大桃主产乡镇设立66个收揽点，方便运输。在岳巧云的合作社门口，就有3家快递公司的收揽点，按老桃农的话来说，往外卖桃，就像过去寄信一样方便。